



## 唐五代宋初敦煌佛教入门读物初探

杨发鹏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通过对敦煌文献中一批具有佛教启蒙性质的文书的简单介绍,对其作出定义、归类,并指出它们的文献价值与地位以及研究的意义。

**关键词:**敦煌佛教入门读物;文献分类;文献地位;文献价值;研究意义

**中图分类号:**B9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08)03-0018-05

佛教传入中土的最初几百年里,主要传播方式是对佛教典籍的翻译。无论东来传法的高僧还是西去求法的行者,大多为中国携来经籍,然后组织人员,把它们由梵语或西域语言翻译成为汉语,进而使之在中国流传。从汉代佛法初传至中原到隋唐佛教繁盛,在这近千年的时间里,翻译成汉语佛经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然而正是由于佛经众多,而其中的名词与义理又多散布在不同的典籍之中,要集中对佛学的主要名词义理有个初步的认识和理解,需要花费很大的气力。再者,佛学义理的繁杂艰深,加上翻译者水平参差不齐,译成汉语后有不少名词及其解释曲径拗口,因此这些佛学名词和义理的流传仅局限于一些高僧大德和少量的士大夫中间,只有他们才能理解和诠释其中的奥义。对于广大的一般僧徒和普通民众来说,佛学深奥的名词义理与他们仍然相去甚远。

迨及隋唐,中国人对佛教的信仰已十分普

及,且经历了几百年的适应和发展,它更趋成熟与繁盛。由于人们对佛学知识的不断积累和认识的逐步深入,同时也是为了适应更多僧俗民众对佛教义理常识等方面认识的要求,一批佛教入门读物便应运而生了。在敦煌石室藏书中,这类佛教入门读物的卷子有数十件,其中主要有《三宝四谛》、《小乘三科》、《三科法门》、《三乘五性》、《世间宗见》、《法门名义集》等。这些卷子类型多样,体制各异,内容丰富。研究它们,对于了解当时敦煌乃至中国社会佛教流行和佛教教育的情况大有裨益。由于目前国内外对于此类敦煌文书的研究尚不多见,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此类文书的探讨,得识其本来风貌。

### 一、佛教入门读物的定义

由于目前还没有以“敦煌佛教入门读物”的名义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章,因此对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有佛教启蒙性质的文书进行筛选、界定就显得很有必要。而对其筛选、界定的前

收稿日期:2008-07-13

作者简介:杨发鹏(1972—),男,甘肃临洮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主要从事敦煌文献与佛教历史地理研究。



提就是对这类文书下一较为准确的定义。我们根据这批文书制作或抄写的目的、内容、语言、性质等，姑且作如下定义：

所谓佛教入门读物，就是以宣传和普及佛教常识为目的，以通俗浅显的语言，易为群众接受的形式，部分或系统介绍佛教名数、义理，使初学者得到佛教基本常识的书籍。

有了这个定义，我们就可以从众多的敦煌文书中挑选出我们要研究的对象，剔除那些与佛教启蒙无关的书籍，从而节省时间和精力，以便更好地进行专门研究。

## 二、佛教入门读物的分类

佛教入门读物是初学者学习佛教常识的启蒙读物，古往今来，这类书籍数量较多，种类较繁。我们可根据其抄写年代、内容多寡、装帧形式等对其进行分类。

### 1.按抄写时代分。

因为本文所要研究的对象是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的佛教入门读物，而这一时期的这类读物都是手写的抄本。另外学者们常常根据这一时期统治敦煌政权的性质，将这一时段的敦煌分为唐统治时期、吐蕃统治时期与归义军统治时期，因此我们也可将这些佛教入门读物分为唐、吐蕃与归义军时期的抄本三类。

属于唐统治敦煌时期的佛教入门的抄本在这些文书中所见很少，仅根据北文002《三科法门》、P.2128《法门名义集》里面有武周新字“𑖀”，判断这两件文书可能是唐统治敦煌时期的抄本。

吐蕃曾在公元786——848年统治敦煌，<sup>[1]</sup>佛教入门读物中可判定为吐蕃时期的有北月91、S.1520等。P.2073正面抄写年代是公元846年，即属于吐蕃时期，而其背面的入门读物可能属这一时期，也可能是以后的归义军时期。

归义军统治敦煌的时间约在公元848——1036年，<sup>[2]</sup>属于这一时期的佛教入门读物有P.

3450、P.2841。

对于大多数佛教入门读物，由于没有关于年代的题记，我们目前尚无法准确地对其进行归类，但它们中的大多数，当是抄于归义军时期。

2.按内容的多寡及复杂与单一程度，可分为综合性与单一性入门读物。

敦煌佛教入门读物大多数篇幅较短，内容不多，形式单一，而且就某一范围内对佛教名数进行诠释，因此把这种文书我们称作单一性入门读物。这类读物占入门读物的绝大多数，如《三宝四谛》、《小乘三科》、《三科法门》、《三乘五性》、《世间宗见》等。也有的入门读物较为全面地搜罗重要的佛教名数、义理进行诠释，它们的篇幅自然要长一些，所包含的内容也丰富一些，把这种文书我们称之为综合性佛教入门读物。这类文书在入门读物中所见不多，如《法门名义集》等。

3.按装帧形式分，可分为卷轴装与册页装两类。

从装帧形式上看，敦煌佛教入门读物中有些是单页的卷子，也有册页装的小册子。单页的卷轴装占敦煌佛教入门读物的绝大部分，蝴蝶装的小册子所见不多，仅见P.3861《三藏法义》、.2822《小乘三科》。

## 三、敦煌佛教入门类读物的文献地位

### 1.敦煌佛教入门读物在敦煌文书中的地位。

自敦煌遗书发现以来，就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大力研究。这除了其本身的价值外，还在于它全部出自当时人之手，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种原始记录，没有经过后人的加工和改造，是最能反映当时社会的第一手资料，所以被称为学术的海洋，我国中古时期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sup>[3]</sup>目前有不少学者逐渐把目光转移到佛教研究上来，而敦煌佛教则成了他们关注的一个重点。这不仅是因为



敦煌佛教在古代曾极度辉煌、盛极一时,也不仅仅因为敦煌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的佛教文书。因为有数量庞大、内容丰富而且原始可靠的一手资料,学者们青睐敦煌佛教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文书共有五万多件,其中佛教文书就占了90%左右。但佛教入门读物的卷子,在整个敦煌文书中所占的比例很小,目前就我所知的这类卷子,仅五、六十件,也就是整个文书的千分之一。虽然入门读物的卷子数量很少,但在敦煌文书中的地位不容低估。首先,这类文书是敦煌文献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丰富了敦煌文献的内容。敦煌文书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内容庞杂,它记载了古代敦煌人民的各种活动,反映了古代敦煌人民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宗教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批包含佛学常识的佛教入门类卷子,能够反映当时人们宗教生活与学习生活的某种侧面,从而使敦煌文献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其二,入门读物类卷子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佛教在唐五代宋初的敦煌非常盛行,敦煌文献中也保留了数量巨大的佛教文献,但反映佛教教育状况的材料尚不是很多,因此这批佛教常识类读物的文书,在古代敦煌佛教教育方面的价值就显得弥足珍贵。

2.敦煌佛教入门读物在整个佛教文献中的地位。

袁德领先生将敦煌佛教文献分为五类:经、律、论类;疏释类;历史类;寺院文书类;音韵文学类。<sup>[4]</sup>方广锬先生将其分为八类:已被历代大藏所收的经典;未被历代大藏所收的经典;历代被视为疑伪经的经典;各类疏释等中国撰述;反映佛教历史的著作;反映敦煌寺院实际宗教活动的著作;各种佛经目录;其他。<sup>[5]</sup>在他们的分类

中,都不见佛教教育教材或佛教入门读物这样的类别,说明他们当时尚未注意到这一类佛教文献。

唐宋以前的佛教非常重视并刻意维护佛教经藏的正统性、纯洁性。佛学家们一般将从印度、西域翻译过来的经典视为正经,而对中国人自己的撰述往往视为疑伪经,所以在历代经目中不作著录,即便著录,也要严加甄别,注明疑伪。因为这个原因,历代经藏多不收国人自己的论、疏、义记,而入门读物连论、疏、义记也算不上,那就更难登入经藏的大雅之堂,所以在历代编纂的大藏经中,很难见到入门读物的影子。如今唯一收入大藏经的敦煌佛教入门读物,是日本《大正藏》里面的《法门名义集》。<sup>[6]</sup>且不说这在数量上少得可怜,而且它还是在敦煌文书发现以后才被日本人补收进去的,因此敦煌佛教入门读物可以填补《大藏经》收录上的缺陷,从这个意义上讲,敦煌佛教入门读物在整个佛教文献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 四、佛教入门读物的文献价值

##### 1. 校勘学方面的价值。

敦煌遗书大抵为千年以前的古抄本,比起现代流通的各种藏经,它们更接近诸经原貌,因此具有较大的校勘价值。与其他敦煌文书一样,敦煌佛教入门类文献同样具有校勘方面的价值,因为这些文献有些有许多不同的抄本。

现以《法门名义集》为例来说明这方面的作用。日本学者在20世纪初编辑的《大正新修大藏经》里面曾收录了部分敦煌佛教写经抄本,《法门名义集》也在其中。《大正藏》所收《法门名义集》是以P.2119号卷子为底本的,因为现存的13个卷号中,P.2119是唯一完整的卷子。然就其录文和排印而言,《大正藏》有一些纰漏和错误,另外在不少地方也出现了错误的断句。正如荣新江教授指出:“……但当时所见的敦煌本极为有限,主要是矢吹庆辉摄自伦敦的写



本,而且《大正藏》排印上有不少错误,有些甚至不可依赖。<sup>⑦</sup>如《大正藏》之《法门名义集》第五品圣贤品大乘四向四果作如下记载:大乘四向四果 须陀洹向。地前三贤菩萨是。大乘须陀洹向须陀洹果。初欢喜地菩萨是。大乘须陀洹果斯陀含向。二地四地五地菩萨是。大乘斯陀含向斯陀含果。第六地菩萨是。大乘斯陀含果阿那含向。第七地菩萨是。阿那含果。第八地菩萨是。阿罗汉向。第九地菩萨是。阿罗汉果。第十地菩萨是。佛是大乘罗汉果。但十地与佛同住究竟地故。得罗汉果名。这段文字读起来确实另人费解,既然是四向四果,每一向与每一果当自分开,但上述某某地菩萨却处于某个向,同时又处于某个果;或处于某个果,同时又处于某个向。如果我们看看P.2317号卷子,上述谬误便一见可知,P.2317的记载是:

四向四果:[须陀洹向] 地前三贤菩萨是 大乘须陀洹向 须陀洹果 初欢喜地菩萨是 大乘须陀洹果 斯陀含向 二地四地五地菩萨是 大乘斯陀含向 斯陀含果 第六地菩萨是 大乘斯陀含果 阿那含向 第七地菩萨是 阿那含果 阿那含果 八地菩萨是大乘阿陀(那)含果 阿罗汉果 九地菩萨是大乘阿罗汉果。

《大正藏》之所以出现文字上的纰漏和断句上的错误,是仅仅依据 P.2119进行录文的。因为《大正藏》在不该标点的地方进行标点,恰恰是P.2119号文书在该处有明显的文字间隔。现在我们可以依据P.2317对《大正藏》的谬误和断句重新校勘,该段文字当为:

大乘四向四果,须陀洹向,地前三贤菩萨是大乘须陀洹向;须陀洹果,初欢喜地菩萨是大乘须陀洹果;斯陀含向,二地[三地]四地五地菩萨是大乘斯陀含向;斯陀含果,第六地菩萨是大乘斯陀含果;阿那含向,第七地菩萨是;阿那含果,第八地菩萨是;阿罗汉向,第九地菩萨是;阿罗汉果,第十地菩萨是。佛是大乘罗汉果,但十地与佛同住究竟地,故得罗汉果名。

诸如上段列举的错误,在《大正藏》所收的

《法门名义集》还有许多处,不能一一枚举。另外这些佛教入门读物的卷子,往往抄本不止一件。如《法门名义集》就有P.2119、P.2128、P.2317、P.3008、P.3009、P.5958、P.3001v、S.6160、P.4943、S.1520、北帝068背、北岷083、北调089等13件之多。这些抄本之间还可以互相校对,此不赘言。

## 2.版本学方面的价值。

在佛教入门读物装帧形式的分类中,我们提及敦煌佛教入门读物不仅有大量的卷子,而且有少数蝴蝶装的小册子,如P.3861《三窠法义》、.2822《小乘三科》。这类装帧形式的小册子虽然数量很少,但在版本学上价值不容低估。

古书是单面印刷的,一面有字,一面无字。一版印刷下来,就是一页,每一页由两个版面组成将书页反折(即有字的一面向里,无字的一面向外),再将所有折好的书页中缝处粘贴在一张用于包背的纸上,裁齐成册。这样的装订,因为翻阅起来书页的两面好象蝴蝶的两翼展开一样,故名。<sup>⑧</sup>蝴蝶装是在雕版印刷发展过程中逐步出现的,宋代印书多采用这种形式。P.3861《三窠法义》、.2822《小乘三科》这两本蝴蝶装的小册子,一则是出现的时间早,即在雕版印刷大量流行之前就已出现。更为重要的是,这两本册子并非印刷品,而是手写的抄本,这对于探索这种装帧形式的源流当有重大的意义。

## 3.传注学方面的价值。

敦煌佛教入门读物的一些卷子中,保留着古代注释佛经的原始形式。传注一般包含对事实、典章制度、凡例、名词物义、句逗、方言等方面的注解,或者是对文字的校对、材料的补充,敦煌佛教入门读物所保留的是对名词物义的注解,如龙大本535号、P.2128、P.2129等。它们先用较大的字体抄写佛教名词,然后在下面用





双行小字注出它的意义、种类或其他解释。例如,龙大本535中对大乘十信的解释:

一者摄取于僧 令善男子五种族出家绍隆 重正法故,名摄取与僧。 二、令僧欢喜 [如]来正法,随顺出家,离身三过,不造诸恶故,名欢喜。 三、令僧安乐 于如来善法,如教奉行故,名安乐……又如P.2129《法门名义集》中的大乘四向四果:地前三贤菩萨是大乘须陀洹向 须陀洹果 初欢喜地菩萨是大乘须陀洹果 斯陀含向 二三地四五地菩萨是大乘斯陀含向 斯陀含果 第六地菩萨是大乘斯陀含果 阿那含向 第七地菩萨是阿那含果 阿罗汉果 八地菩萨是大乘阿那含果 阿罗汉果 九地菩萨是大乘阿罗汉果。

这类文书在传注学上的价值是它们保存了佛经注解的原貌,对于我们研究传注的形式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五、佛教入门读物研究的意义

### 1. 帮助理解佛教名数的含义。

佛经的翻译、疏释、撰述是佛教在古代中国传播和流传的重要方式,古代中国翻译撰述了数量庞大的佛经。由于民间的普遍信仰和历代大多数统治者的重视,许多佛教典籍得以保存至今。然而,这些典籍产生和盛行的年代毕竟离我们非常久远,而且,佛经大多外来之物,翻译成汉语又诘曲拗口,加之佛教名词义理玄奥晦涩,对于今天的人来说,要了解和学习佛教典籍知识,实属不易。幸亏敦煌石室保存的《法门名义集》、《三乘五性》、《五乘三性》、《三宝四谛》、《三科》等佛教入门类书籍,使得我们在认识和学习佛教知识时寻找到了较为便捷的途径

2. 入门读物卷子的发现与利用,将会开辟敦煌佛教文献研究的新领域。

佛教在古代敦煌曾一度繁荣昌盛,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面来关注、研究敦煌的佛教,但是目前对古代敦煌佛教教育的研究

尚不多见,这批包含佛学义理常识读物的整理、研究,必将对敦煌佛教教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与思路。

### 3. 便于探究唐五代宋初敦煌寺学之教材。

敦煌寺学是中古敦煌教育一种重要而又独特的形式,然而对于这一时期敦煌寺学的研究至今仍有许多不明之处。尤其在寺学使用的教材方面,学者们仍拘囿于传统的儒家教材,这显然与寺院办学的宗旨不太一致,而敦煌佛教入门读物的研究无疑会弥补敦煌寺学教材研究上的缺陷。

### 4. 便于研究敦煌佛教的世俗化。

对佛教世俗化的研究是目前佛教研究的热点之一。佛教世俗化也是唐五代宋初敦煌佛教的一个典型特征,它在这一时期的敦煌有着多种表现形式。佛教入门类读物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体现出佛教世俗化的某些迹象,所以对于这批材料的整理研究,无疑将会推开佛教世俗化研究的一扇新窗。

### 参考文献:

- [1]陈国灿.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J].敦煌学辑刊.1988(1).
- [2]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3]刘进宝.敦煌学述论[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
- [4]袁德领.敦煌遗书中佛教文书简介[J].敦煌研究,1988(1).
- [5]方广钊.敦煌遗书中的佛教著作[J].文史知识.1988(10).
- [6]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54册[M].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120.
- [7]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50.
- [8]杨燕起,高国抗.中国历史文献学[M].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1989.260.